

# 提升民族精神的诗史

## ——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一个侧面

王树森 余恕诚

**内容提要：** 唐代有关吐蕃诗歌是一部培育民族精神的诗史，它通过对唐与吐蕃两个半世纪交流碰撞历史的纪录，展现了中华民族直面挑战的血性担当、不离不弃的执着守望、正视矛盾的自我省察与和谐包容的博大胸怀。依靠其坚强支撑，中华民族不仅从未被苦难征服，相反却在奋斗中受到锻炼，获得提升，铸就辉煌。

**关键词：** 血性 守望 自省 胸怀

自7世纪初起，直至9世纪中叶，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曾上演过一幕由中原李唐王朝与高原吐蕃政权所主导的，兄弟民族从交流碰撞走向认同融合的长篇历史正剧。这段波澜壮阔的民族关系史<sup>①</sup>，不仅被详实记录在各类汉藏历史典籍中<sup>②</sup>，当时正处高潮的诗歌，也予以了持久而深入的关注。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总量在一千三百首左右<sup>③</sup>，具有重大的诗史意义。不仅因为它们记录了两百多年里兄弟民族之间歌与泪共存、酒筵与诈局并见，彩礼仪仗与兵戈剑戟同在，兄弟阅墙交织的细节，更在于反映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心理上受到的砥砺磨练。本文将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看成一部提升民族精神的诗史，研究其在民族精神培育中的重要意义。

---

① 唐与吐蕃的关系史，自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吐蕃松赞干布遣使来唐，唐太宗随即命使回访拉开帷幕，到唐武宗会昌年间朗达玛被害，吐蕃衰散，继而宣宗大中三年(849)之后，秦、原、安乐等三州七关回归，张议潮所领导的归义军向唐贡献河西十一州图籍，始告一段落。

② 如《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吐蕃僧诤记》等。

③ 其中，清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载九百余首。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徐俊辑校《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任半塘编著《敦煌歌辞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诸书，共录有不见于传世文献的有关吐蕃诗歌四百首左右，本文所引诗歌，均出自上列诸书，不再另注。

### 直面挑战的血性担当

历史上的中原民族,行为方式上偏于敦厚而刚健或有所不足。一旦遭遇外部竞争,有时会选择以退让妥协换来相安无事<sup>①</sup>。相形而下,在唐代中原王朝与吐蕃等民族政权所展开的角力中,各方则表现出一份难得的血性担当、英风豪气,这对提升全民族精神品质,起到了推动作用。唐初,李世民曾在较短时间内令周边臣服,也奠定了强大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但由于吐蕃的勃兴,并积极东向争胜,使唐的权威受到挑战。压力之下,中原诗人的豪情瞬间被激起。初唐崔融说:“一朝弃笔砚,十年操矛戟。岂要黄河誓,须勒燕然石”(《塞垣行》),自豪于投笔从戎的人生选择,希望解除外患、纪功而还;骆宾王曾从军西域,连作十余首诗歌,激情昂扬:“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从军行》)。这些诗句,象征着民族血性的壮丽回归。

中华民族直面挑战、勇于担当的精神品格,在盛唐边塞诗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展现。由于盛唐时期的西北战事,更多缘于反制吐蕃扩张,对中原王朝而言,带有一定自卫性质,诗人们对战争表现得更为积极。高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歌六章》等作,都将唐对吐蕃军事胜利的欢庆喜悦乃至骄傲自矜<sup>②</sup>,渲染至于极致。王昌龄诗云:“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其四),或许今天需要摒弃的大民族主义情绪,但渗透其中的保卫家园的爱国感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时过境迁之后,无疑已经内化成包括汉藏两族在内,全民族共同继承与依靠的精神财富。

伴随着对战争的伦理认同,盛唐边塞诗中竭力讴歌广大边防将士的英勇、谋略与牺牲。王维的《陇西行》《出塞作》,以热烈的笔墨,塑造了一个个走马扬鞭、射雕渡辽的勇士形象;其《老将行》中的那位沙场老将,本已弃置衰朽,学古人种柳卖瓜,但当边疆烽火再度燃起,却又立刻容光焕发,跃跃欲试。玄宗后期,对于哥舒翰、高仙芝等边疆主将的赞美成为诗人抒发情怀的重要依托。高适说哥舒翰“威棱慑沙漠,高义感乾坤”(《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李白将哥舒翰称为英才,言其“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其中自然有不当甚至谀颂之处。但是若联系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的诗句,则可知其背后饱含着中原对于良

<sup>①</sup> 周代始祖古公亶父主动避让戎狄等族的袭扰,迁居岐下的故事,在《诗经·大雅·韩》及《孟子·梁惠王下》等先秦文献中,均有追述。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导致中原大地“衣冠南奔”,两宋面对辽金等北方王朝的金戈铁马,只能选择称臣割地,以至汉族文人沉痛哀叹。

<sup>②</sup> 开元天宝年间,唐王朝在西域展开的军事行动,虽不是直接与吐蕃碰撞,背后也有显著的吐蕃因素影响,对此,笔者将另文予以论述。

将、对于英雄的深切呼唤。

盛唐文士热衷赴边,李白曾感叹“安西幕府多才雄”(《送程刘二侍御兼独孤判官》),军幕文士之盛可见一斑。盛唐送人从军边塞的诗歌很多,王维赠诗宇文三:“当令犬戎国,朝聘学昆邪”(《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军司马》),又嘱咐平淡然:“当令外国使,知饮月氏头。”(《送平淡然判官》)李白送郑灌,有“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一)、“斩胡血变黄河水,枭首当悬白鹊旗”(同上,其三)这样极富鼓动性的寄语。虽是以杀伐相勉励,却出自强烈的家园热忱。诗人自己也积极寻求献身沙场的机会,杜甫作《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诗,中云:“军事留孙楚,行间识吕蒙。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向哥舒翰表白向往入幕立功的心迹。而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诗人,则确实亲赴边塞。“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丈夫三十未富贵,岂能终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岑参的这些诗句,代表着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奏响了一曲时代强音,民族强音,让一个原本偏于静默的民族,瞬间爆发出强大的精神张力。中唐戎昱、李益、卢纶等人的边塞诗,依然充满豪情。此后类似于“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令狐楚《年少行四首》其四)、“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穴。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李商隐《骄儿诗》)这样激昂的声音,都能让人听到盛唐边塞诗的回响。

盛唐边塞诗所唱出的英雄赞歌,反映了中原社会直面挑战的勇气,其实不独内地,边疆亦然。敦煌伯 3451 卷“《张淮深变文》末附诗七首”,以热烈而又充满敬意的笔触表彰了西北民族地方首领的赫赫武功:“天生神将□英谋,南破西戎北扫胡。万里能令烽火灭,百城黔首贺来苏”;“年初弱冠即登庸,匹马单枪突九重。曾向祁连□□□,几回大漠虏元驼”,其豪情健骨,置诸盛唐一流边塞诗中,也毫不逊色。伯 3633 张文彻《龙泉神剑歌》长诗所提及的张西豹、阴仁贵、罗通达,同卷同人“阙题三首”所歌咏的三位将军——吕万盈、罗俊诚与慕容氏,反映出广大边疆地区民众,在长期奋斗的过程中,同样培育起英雄主义的价值取向。正是由于不论何处,都能自觉而坚定地信仰、依靠这种令人动容的血性担当,从来都不会动摇古老的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精神铸就起的钢铁长城。

### 不离不弃的执着守望

唐代有关吐蕃诗歌还诠释了在困境中依然不轻言放弃的坚定信念。吐蕃与唐的竞争,在中唐以后,焦点是持续近九十年的河湟危机。诗坛上,收复失地、解救遗民的呼声也因此鼓荡百年。早在河湟沦陷之初,杜甫即表达对于唐室的坚定信心,警告吐蕃停止寇扰蚕食行为。大

历年间,由于吐蕃进攻一度受挫,更显著增强中原社会的希望:“北逐驱獯虏、西临复旧疆”(李益《从军有苦乐行》)、“朔野长城闭,河源旧路通”(戎昱《泾州观元戎出师》)的高歌此起彼伏。当时唐蕃尽管鏖战,但仍未废通使,因而很多诗人在送别人蕃使诗歌中频频表达对于故地遗民的牵念不舍:“汉垒今犹在,遥知路不迷”(郎士元《送阳中丞和蕃》)、“旧国无由到,烦君下马题”(李益《送常鲁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州》)、“此去多应收故地,宁辞沙塞往来频”(韦应物《送常侍御鲁却使西蕃》),直至晚唐,李商隐、杜牧仍在诗中不断表示对于河湟回归的信心与期待。这种信心与期待,看似无力,却制约着故地遗民被彻底放弃的企图,具有一种可贵的精神。

河湟沦陷百年,除了广大内地军民始终未放弃收复失地的努力外,生活在沦陷区的唐朝遗民同样没有轻易屈从,依然顽强坚守本民族文化传统,依然坚信终究会有人来解救。贞元二十年(804),吕温奉使吐蕃途中,留下《题河州赤岸桥》与《经河源军汉村作》二诗,前诗云:

左南桥上见河州,遗老相依赤岸头。匝塞歌钟受恩者,谁怜披发哭东流。

后诗云:

行行忽到旧河源,城外千家作汉村。樵采未侵征虏墓,耕耘犹就破羌屯。金汤天险长全设,伏腊华风亦暗存。暂住单车空下泪,有心无力复何言。

使节经停当地,遗民们相互扶持候于道旁,希望能与之交谈问讯,打探来自东方的消息。尽管已是披发左衽,依然向东恸哭,不忘中原。不仅如此,广大遗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聚族而居,做最艰苦顽强的文化坚守。

中原诗人元稹《新乐府·缚戎人》中刻画了一位九死一生的落蕃唐人形象:

……中有一人能汉语,自言家本长城窟。少年随父戍安西,河渭瓜沙眼看没。……少壮为俘头被髡,老翁留居足多刖。乌鸢满野尸狼藉,楼榭成灰墙突兀。……五  
六十年消息绝,中间盟会又猖獗。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近年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常教孙子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老者傥尽少者壮,生长蕃  
中似蕃悖。不知祖父皆汉民,便恐为蕃心砣砣。……

这位少壮时既已落蕃的唐人，境遇悲惨。然而他最为关切的却是怎样维系民族文化传统，为此付出了艰辛而又细致的努力。然而时光流逝，当回归无望，老人们又渐次凋零，对于生长蕃中的新一代可能会数典忘祖的担忧却一直如影随形。也正是由于不堪忍受这种恐惧的心理煎熬，落蕃唐人最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冒死逃归。

无论是吕温笔下的桥上遗老，还是元稹诗里的落蕃唐人，其言行都体现遗民群体的集体心理。当这种心理不断加深、积聚，必然会产生精神能量的质变，从而最终会促成故地归来、同胞相聚。伯 4889□定千《颂司空口号并序》（序略）云：

况说龙沙最边陲，关河阻隔远明时。蕃戎把隘当路坐，何日申奏圣人知。今遇司空来宣问，枯林滋润再生枝。四面六番多围绕，伏恐寻常失朝仪。若不远仗天威力，只怕河湟（湟）陷戎夷。请须司空奏论事，封册加官莫改移。比至来秋新恩降，山林草木总光辉。塞上艰辛（辛）无说处，一心目断望龙墀。

长期孤悬塞外，遗民所受精神折磨自是沉重，但无论遭遇何种困境，他们从未动摇过内心深处的信念。当山河完聚之时，可以想象他们的喜悦与激动。这首诗中所写，难免过分夸大唐王朝在收复河湟中所建之功（其实河湟回归更大程度上是西北各族人民的自觉选择），但河湟百姓在经历百年流离之后，那一份真挚醇厚、不能自制的赤子之情，却不难从中读出。

### 正视矛盾的自我省察

唐蕃间的激烈碰撞，也为更好认识各自本身提供了契机。玄宗后期的穷兵黩武，虽为巨大的军事胜利所掩盖，但有识之士仍能清醒指出其害。杜甫《前出塞九首》从各个角度揭露了官场与军队的阴暗面，甚至发出“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的质问；《兵车行》则直接将边疆上的死伤归咎于开边之策：“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能于一片颂歌盈耳之际，批判军政黑暗，既需要勇气，更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日趋成熟。

伴随着河湟危机的久拖不决，唐王朝内部的腐败无能、僵化落后，越来越暴露无遗，朝野上下开始正视反思自身的弊端。杜甫晚年，面对接连发生的吐蕃陷京、西川警报以及仆固怀恩叛乱事件，不断批判唐代宗君臣御敌无术，尤其是宠任宦官程元振，造成离心离德、无将可遣的危局。有关诗作全都指向唐内政之恶，感情极为沉痛<sup>①</sup>。杜甫身后，尽管唐朝内部不断有人振臂高呼、希图早日收复失地，然而无一实现，许多人甚至含恨九泉。形势的无所改观，越

<sup>①</sup> 参见王树森、余恕诚《唐蕃关系视野下的杜甫诗歌》，《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

来越引起诗人们的愤懑不满。中唐张籍《凉州词》其三：

风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

此诗批判的矛头所指，在于“拥高牙”而“忘敌忾”的“诸将”们。元稹、白居易《新乐府》中，写吐蕃的《城盐州》《西凉伎》《缚戎人》等诗篇，批判则更为集中痛切。白居易言《城盐州》的主旨是“美圣谟而诮边将也。”《缚戎人》是“达穷民之情也。”《西凉伎》是“刺封疆之臣也。”题旨的明示之外，诗歌本身自有极为尖锐的指斥。元稹质问养寇自保，徒知享乐的边将：“连城边将但高会，每听此曲能不羞？”又讽刺边将虚功市宠的丑态：“缘边饱喂十万众，何不齐驱一时发？年年但捉两三人，精卫衔芦塞溟渤。”表明社会关注的重心已由忧虑外患之强，转为痛惜内政之失。

中唐文人对于内政偏失的反思，所责尚仅止于边将等臣僚，到了晚唐，诗人则直接对准唐朝最高君主发难。唐敬宗宝历年间，尚处少年的李商隐曾有《富平少侯》一诗：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此诗主旨为讽刺敬宗的荒淫娇憨，而首句所谓“七国三边未到忧”，则将当时的藩镇割据与边患频仍并提，并一概归咎于人主不思进取。清人冯浩笺云：“统观李唐全代，中叶以后，河朔既不可复，诸藩镇屡有擅命，吐蕃、回鹘、党项先后频入寇，盖内外皆不宁矣。而敬宗童昏失德，朝野危疑，故连章讽刺，以志隐忧。此章首七字最宜看重。”<sup>①</sup>大约同时，杜牧也有一首批判更为集中、讽刺更为痛切的《河湟》，诗云：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箭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河湟落蕃，几代君臣均曾计划收复，此诗所标举的唐宪宗与代宗朝宰相元载即为推动最力者。然而纵然是他们，受制于唐朝内政的总体黑暗腐朽，最终仍是赍志而歿。迁延岁月，全社会均沉浸于淫靡之风，所谓“闲人”，既然有元载相公、宪宗皇帝作对照，则明显有讽刺当朝

<sup>①</sup> 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0页。

君相之意。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咏史》等诗,无不对于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些振聋发聩的诗句,无疑是诗人经过艰苦求索而获得的思想结晶,更代表着壮阔而又曲折的民族碰撞,在带来巨大苦难的同时,给古老的东方民族在精神上心理上最为关键的磨练与补偿。甚至在吐蕃瓦解,河湟回归之后,尽管一千朝臣谀颂,但是许棠、张乔、于濬等唐末诗人,依然不断于诗歌中指出边地仍未获安的事实<sup>①</sup>。居安思危,这是走向成熟的表现。

### 和谐包容的博大胸怀

兄弟民族间旷日持久的杀伐征战,特别是由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与牺牲以及军政黑暗、社会不公,引起诗人们长期痛切的哀叹,唐代有关吐蕃诗歌在这一层面所表现出来的深沉情感,往往易见易察。其实渗透在诗歌中的,超越民族界限、更为成熟稳健、博大宽容的民族交往理念,更在根本上促成了兄弟民族从不打不相识、走向更高层次的融合一体,更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与其他一切民族间交往所不同的是,唐与吐蕃几乎从甫一接触起,就建立影响深远的亲戚关系,中宗朝金城公主入藏,在群臣送别公主的集体赋诗中,和好的理念一再被突出,显示出唐朝高层的诚意与胸襟。后来尽管兵戎大举,但目光长远如杜甫者,仍然大声疾呼“舅甥和好应难弃”(《近闻》)。中唐以后唐使入蕃,送行者也屡屡示以改善唐蕃关系的职任,“继好”、“旧好”、“和戎”等词语,在相关诗歌中出现频率很高,都说明社会对于重建民族友好怀有很高期待。从吕温、刘元鼎、沈亚之等人的诗文中看,无论是唐使入蕃,还是蕃使入唐,所受接待都是热情周到的。唐穆宗长庆元年(821)、二年(822),唐蕃双方再次会盟,“商量和谐”的理念再获重申,反映了唐蕃双方在处理民族关系时,胸怀都更为宽广、眼光也更为长远。

民族和好相处心理的成熟与认识的加深,到了唐蕃关系处于结局时期,在诗中的反映尤为深刻。大中三年(849)二月,由于吐蕃衰落,当地各族人民向往统一,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七关来降。八月,“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己丑,上御延喜门楼见之,欢呼雀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sup>②</sup>这是唐蕃关系后期的标志性事件,其时一向关注西北边防问题的李商隐,在其《漫成五章》(其五),特就唐朝应对与处置吐蕃的历史全程进行了回顾与思考:

郭令素心非黠武,韩公本意在和戎。两都耆旧偏垂泪,临老中原见朔风。

<sup>①</sup> 参见余恕诚、王树森《唐代河湟诗歌的诗史意义》,《学术界》2012年第8期。

<sup>②</sup>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卷248,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40页。

这首抒情诗的背后,有着宏大的叙事背景。当此唐蕃角力基本上可算画上句号的时候,诗人在回顾中点评唐开国以来曾有效处理西北军务的名将,包括战与和两个方面,认为郭子仪和张仁愿(封韩国公)虽然屡立战功,但其本心却在和戎,而非黩武。虽字面上只提郭、张,而晚唐时期扭转边境被动局面,与河陇回归有更为直接关联的名相李德裕,自亦在不言之中。因其在宣宗上台后即遭远贬,且被诬生事边疆,诗人辩解李氏其实亦如郭张二公,本意在实现和平。两都耆旧的垂泪,既在庆贺迟到的和平,也是向一切有功于民族和解的前辈致敬。

李商隐的《汉南书事》,也作于晚唐吐蕃衰散、河湟来归之际:

西师万众几时回,哀痛天书近已裁。文吏何曾重刀笔,将军犹自舞轮台。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陛下好生千万寿,玉楼长御白云杯。

这也是就如何处理边疆民族关系抒情发论的诗篇。诗中尊崇“王道”,以“穷兵”为戒,对皇帝哀痛反省,约束边将的举措加以颂扬,认为有“好生”之德,这与《漫成五章》一样,都是在吐蕃衰落、唐方在边境重新占据优势的形势下,对边政的又一次思考。《尚书·大禹谟》中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sup>①</sup>,原本单指治理境内之民而言,这里则显然包含了少数民族。把本质上可以归于人道主义的“王道”、“好生”,扩大推广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这是任何缺少理性、缺少历史积淀的民族所不可能有的。至此,可以看到,唐代有关吐蕃诗歌,既反映了蕃汉长期角力所焕发的民族自强精神,也宣示了经过双边和多边战和往来所得之构筑民族和谐关系的胸襟。

这种胸襟并不只是高高在上的讲章,而是确实体现在兄弟民族同胞的具体交流交往中。岑参逗留北庭期间,写下“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奉陪封大夫宴》)的诗句,证明当时西域各部各民族之间走动密切、相互欣赏,由汉族将领所主持的军幕中,竟然有如此多的边疆民族庶众。元稹的《新乐府·西凉伎》,以满是怀念的笔触,追忆了玄宗时期在西北的多民族大联欢。甚至到了张议潮统领河西时期,包括汉藏民族在内的西北各族之间,依然往来无碍、交流深入,伯 3500“阙题”诗中,写到“四面蕃人来跪伏”的场面,看似有骄矜之意,其实所反映的,恰是和睦共处的融洽民族关系背景。

无论是中原还是边疆,都已经在心灵深处将彼此视为手足同胞,所以即便唐代民族关系历经曲折,但是在社会大众那里,早已抛弃了封闭见外的旧观念,学会了感同身受地体验彼

<sup>①</sup>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此的悲欢冷暖。唐诗中即表现出对于兄弟民族更加令人动容的关爱。李颀《古从军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既用汉武帝时受命下嫁乌孙的江都王女的史事，指出民族战争给和亲公主心灵上带来伤痛，同时也以“胡雁”无处栖身之哀鸣，衬托“胡儿”落泪之伤心，饱含人道主义精神的温热度。大历年间，由于陇右陷落，通向西域之路阻断，滞留唐境的客籍人员无法返回故土。他们的遭遇，引起了诗人的普遍同情。李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歌》：“无定河边数株柳，共送行人一杯酒。胡儿起作和番歌，齐唱呜呜尽垂手。心知故国西州远，西向胡天望乡久。回头忽作异方声，一声回尽征人首。”由送人归中原，引起军中“胡儿”对“旧国西州”的怀念；“胡儿”歌舞时思乡的表现，又引起广大军士一齐回首望乡。“胡儿”与“征人”，虽然民族不同，但是面对“故国关山无限路”所生发出的强烈怀乡情绪，却相互感染，交融在一起。而诗人则由眼前的行人相送，推己及人，表达对兄弟民族民众的无限体贴之情。

吐谷浑民族曾经雄踞青海三四百年，在中原与青藏高原的交通往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唐蕃之间的重要缓冲。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谷浑为吐蕃所灭，贞元末吕温使蕃期间，曾遇吐谷浑部落，其《蕃中答退浑词二首》（题下自注云：“退浑种落尽在，而为吐蕃所鞭挞，有译者诉情于予，故以此答之。”）诗云：

退浑儿，退浑儿，朔风长在气何衰。万群铁马从奴虏，强弱由人莫叹时。

退浑儿，退浑儿，冰消青海草如丝。明堂天子朝万国，神岛龙驹将与谁。

第一首是叹息吐谷浑民族眼下刚气不振，遭受吐蕃统治者奴役；第二首则以严冬将去、冰雪消融的节序递换象寓，意在勉励吐谷浑自强自立，并暗示唐朝天子一直牵挂他们，期待着他们重新归来。无论这首诗歌是否带有政治性的“分化瓦解”之意，面对青海湖畔的古老民族，诗人的同情之感与唤醒之意都是发自内心的。

吐蕃长期作为唐王朝的对手存在，照理说，唐朝对蕃人有理由怀有仇恨敌视情绪。然而即便是素以“排佛攘夷”著称的韩愈，在贬谪潮州途中偶遇配流潇湘的吐蕃降人，也写下《武关西逢配流吐蕃》一诗，诗云：

嗟尔戎人莫惨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

唐蕃对峙,边境驻军常常会俘获对方人员。对于吐蕃俘虏,唐方一般是送往东南等地安置,韩愈此处所遇即属此种。这位因排佛遭贬的高官,虽是说自身远谪之苦比起这些吐蕃俘虏更甚,但是能够将哀矜的目光投向配流蕃人,其表现出的却是一种超越民族恩怨的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

## 结 语

张岱年曾用《易经》中“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中华民族的精神<sup>①</sup>。如果说唐代有关吐蕃诗歌中所表现出的直面挑战的血性担当与不离不弃的执着守望,代表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那么正视矛盾的自我省察与和谐包容的宽广胸怀,就是“厚德载物”的兼容品格。二者都不是在晏平安豫的环境中轻易可得,都需要经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锤炼。唐人柳宗元云:“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sup>②</sup>唐与吐蕃交流碰撞两百余年,给各方都带来巨大的震荡,然而,正是得益于震荡的洗礼、苦难的磨砺,民族精神得到升华,民族心理走向成熟,兄弟民族间共存共处的智慧与胸襟受到锻炼。这些宝贵的民族精神品质,最终广泛而深入地获得了中华大家庭各民族成员的认同,这才是稳定而强大的民族共同体所必需的根本精神资源。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明乎此,我们才能读懂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精神实质。

本文构思与撰写之时,恩师余恕诚先生已身染重疾,尽管如此,他对文章的观点与思路仍竭尽心力。2014年8月23日,先生终于不起,未及得见文章面世。王树森拜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项目编号:11BZW039)的阶段性成果。

(王树森,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余恕诚,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吴 刚】

<sup>①</sup> 参见张岱年主编《心灵长城》,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页。

<sup>②</sup> 柳宗元:《敌戒》,《柳宗元集》卷19,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33页。